

18.01

长沙文史资料



文史资料研究会 主编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

2

1985.7

长沙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(内部发行)

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

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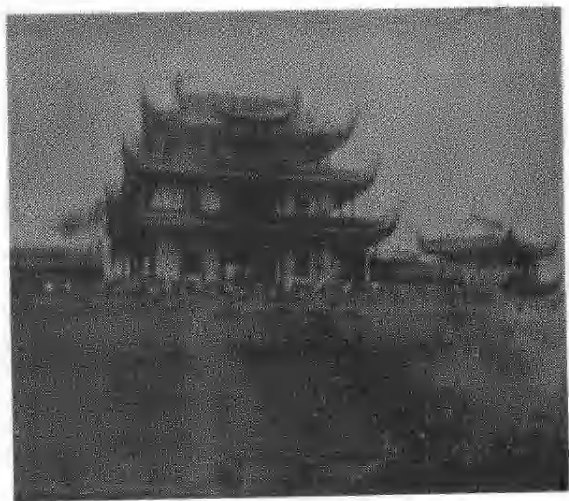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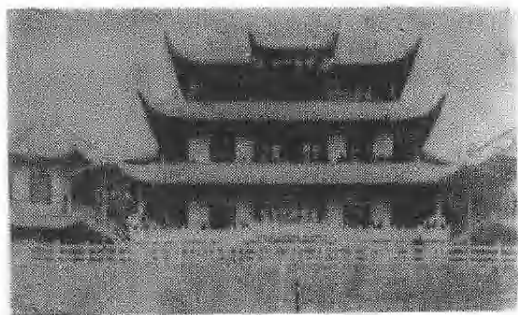
※

1985年7月 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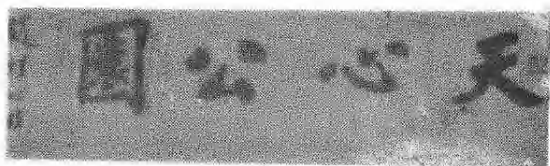
大32开本 字数: 124,000

印数: 1-3,000 定价: 0.86元

「文夕大火」前的天心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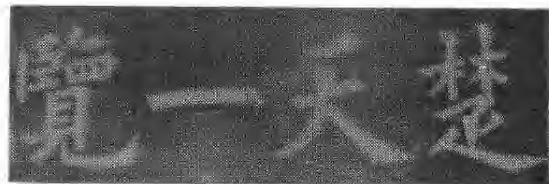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重建的天心閣



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同志所书“天心公园”门额



悬挂在三楼东南向的“天心閣”匾额（集黄自元帖）



悬挂在三楼西北向的“楚天一覽”匾额（集欧阳询帖）



原开福寺外景全貌

邱石如摄于一九三七年

附： 原古开福寺外景全貌照片说明

邱石如

这幅长沙北郊原古开福寺外景全貌的照片，系摄于一九三七年，因底片保存尚好，故历时近半个世纪，犹能放大制版，虽不十分清晰，大致尚可辨认。现将片中景物，结合寺史，说明于下：

抗日战争以前，古寺山门后即有一塘清水，呈现眼帘，整个庙景，投影其中，相映成趣；此塘名“放生池”。旧时不少善男信女，将各水族，投放池内，以体佛家戒杀之义。现在“放生池”绝大部分已填为菜土。寺的前殿，名三圣殿，系一九二三年前，住持宝生经手修建，高瓦飞檐，气宇非凡；庙门左右墙上，嵌有石刻对联，文曰：“法界无心地；华严不二门。”

门上楣嵌石刻“真阿兰若”横额。“阿兰若”即梵语“寂静的地方”之意；而“真”者，谓此寺乃真其境界，与门联有呼应之妙。殿外墙面，原有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浮塑篆字，照片上仍依稀可辨，今已毁去。殿内原塑有西方三圣（阿弥陀、观世音、大势至）全身立像，每尊高约一丈，亦于十年动乱中被毁。三圣殿外左右，原各建有三级塔式楼阁一座，东为钟楼，西为鼓楼，形如两翼，把前殿衬托得更显雄伟；这种塔式楼阁建筑，不仅省内无此规模，即在全国亦属罕见。此两楼系一九二八年前后，了凡和尚担任住持时所建，因为木质结构，经风雨剥蚀，加之解放以前，常驻军队，而又年久失修，大部圯倒，故于一九五二年经上级批准将其拆除，但两楼石基尚存，长约两丈，宽略次之。钟楼以前，原有古樟一株，树干粗大，须三、四人方可合抱，亦不知何时伐去，但其枝叶繁茂之状，于照片中犹略可见。

此古寺现正逐步修复，内部已基本修缮完竣，大殿正维修，但外景是是否能够全复旧观，则尚未能断言。

目 录

文

夕

大

火

- 长沙文夕大火真相……………夏 瑛 (1)
- 长沙大火真相详记……………张治中生前口述
余湛邦综合整理 (16)
- 关于长沙文夕大火的若干补充……………余湛邦 (40)
- 长沙大火案审理经过……………张耀辰 (45)
- 长沙大火回忆……………吴世偕 (51)
- 鄧悌和长沙大火……………如 几 (60)
- 记长沙大火之夕……………徐石林 (64)
- 三和酒肆放火队 保金城北千百家……………戴哲明 (68)
- 长沙大火前后见闻追记……………谭天洋 戴哲明 (71)
- 长沙火劫词……………黄性一等 (75)
- 长沙文夕大火房屋受灾示意图……………陈树钧 (插图)
- 劫余房屋知多少……………陈树钧 (83)
- 回忆父亲刘岳厚……………刘笃平 (88)
- 长沙邮政简史
——一八九九年前长沙邮政概况……………李竞秋 (106)

湖南邮工收回邮权斗争始末记

.....丁士雄 刘齐家 沈迪猷 (116)

人物
小传

张以藩.....黄曾甫 (136)

肖元定.....刘笑春 (138)

长沙名胜：开福寺史略.....戚 圆 (140)

附：原古开福寺外景全貌照片及说明

.....邱石如(插页)

天心阁始建年代考.....李行之 (145)

附：天心阁照片一组.....(插页)

长沙特产：宁乡四种贡品小史.....蒋绥荣 周德氏 (148)

九如斋几种名牌特产.....李泉林 (152)

长沙民俗：立夏用秤称人.....兰 烟 (155)

立夏梗.....兰 烟 (157)

文史
知识

邦 贝.....郝 佬 (158)

✓ 邮 驿.....朱维祺 (160)

楹联选刊：重建天心阁楹联选登..... (162)

编 后..... (165)

长沙文夕大火真相

夏 琰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深夜，国民党在所谓“坚壁清野”的幌子下，下令纵火长沙，将三十多万人的文化古城付之一炬。长沙城垣几乎成了一座废墟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。这就是历史上称为“文夕大火”的事件。

急转直下的抗日战争形清

一九三八年十月间，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。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打通粤汉铁路。十月二十五日，武汉沦陷，日寇举兵沿铁路线清犯。地处粤汉线中部的湖南省会长沙，从抗战的后方变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前线战略要地。当时，国民党许多重要机关，分别撤驻于长沙至衡阳一带，大批人员、物资都要由长沙向黔、桂、川转移。十一月十日，岳阳失守，日寇迅速逼近新墙河，侵略者的魔爪直接威胁长沙。长沙的形势更趋紧张。长沙的命运如何？是固守还是放弃？成为当时云集长沙的国民党党、政、军要人和各界人士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，住在长沙近郊。蒋介石往来于长沙与南岳之间。在这危急的时刻，蒋介石这样一位“权势人物”亲临长沙，曾燃起人们的一线希望，希望他调布重兵于湘北，以拒日寇，稳定长沙局势，保卫古城长沙。谁料，蒋介石到长沙后，只高唱

“焦土抗战”，竟然亲自部署要将长沙焚毁。人们的“希望”很快落空，而落得的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。

纵火长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

这场大火是怎么发生的？据亲历者的回忆及文献记载，这场大火是蒋介石“焦土政策”指导下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，是蒋介石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。

原来在武汉撤退时，蒋介石就提出了所谓“焦土政策”，他那时就打算把武汉三镇焚毁。只是由于消息走漏了，遭到外商的反对，又仓促撤退，故未能得逞。武汉沦陷后，蒋介石即在长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。据蔡杞材回忆，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、陈诚、白崇禧、冯玉祥、张群、张治中等。会上，蒋介石斥责武汉撤退时，没有实行“坚壁清野”，使大量物资器材未能疏散破坏，资敌所用。是以决定长沙不守时，予以“彻底散坏”。长沙高级军事会议后不几天，蒋介石到了南岳，在南岳又召开高级军事会议。他在会上重申了要彻底破坏长沙的方针。

南岳会议后，蒋介石又到了长沙。十一月七日下午，在蓉园何健的别墅再次举行军事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、杨森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，长沙市长席楚霖，长沙警备司令鄧梯等党、政、军、警各界要人。会上，蒋介石首先哼了几句：“抗战必胜”，“建国必成”的老调，接着就问张治中：“敌人来了，你们长沙怎么办？”张治中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蒋即说：“还有什么可思索的，烧掉就是了。我们不能住，也不能叫敌人来住。”蒋又说：“不论粮食器材，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，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。”这一个会开了两个钟头，

蒋介石不断地说怎么放火，怎么放火。在恐日成疾的蒋看来，日寇要打通粤汉线，长沙是守不住的。与其象武汉那样弃城而逃，不如放一把火，以一城之焦土来标榜自己还是坚决抗日的。

这次会议后，张治中为执行蒋介石的指示，立即采取了应变措施。关于焚城的计划，张治中把任务交给鄧悌。鄧悌责成他的参谋长石国基和参谋处长许权制定。

十一月十日，岳阳弃守，长沙的气氛更加紧张。据席楚霖等人回忆：这天的下午和晚上，省政府、长沙警备司令部连续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如何实施焚城计划。长沙警备司令部在白马巷司令部所在地，召开长沙各机关、各公法团体、水陆警察局、省市党部、在长沙的中央机关、军警宪各单位的联席会议。会议由石国基参谋长主持。他说：“由于湘北战事紧迫，长沙要放弃并进行破坏。全市要作紧急疏散。”接着参谋处长许权宣读了破坏长沙的具体方案。他还说：“这个方案业已呈报省府核示，长沙撤退时执行”。方案的大意是：抽调一个团的兵力，装成从前线撤下来的，分驻全市各处，暗中将军队编组，五人为一小组，配备放火器材，若干小组编为一队，由队长统一指挥，按指定地区执行放火任务。放火队还备有摩托车，插上白旗以为标志，视放火命令下达后放火。据张文心回忆：还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，下设区指挥和若干纵火队。徐昆为正指挥，王伟能、许权为副指挥，后撤警戒由徐昆领导的警备二团负责。放火时间要视日军进逼长沙的情况来定。

纵火长沙是对人民的突然袭击

原定国民党军队从新河撤退时，再候令纵火。但长沙大火

时，岳阳虽告失陷，而平江、汨罗以北阵线还比较稳定，长沙距前线尚有二百多里。但自警备司令部十日下午会议后，市区便出现战时状态，市民惶恐不安。纵火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进行。

十日下午，破坏长沙指挥部便开始积极准备纵火器材、汽油煤油，并在各交通要道上拦劫车辆，以为最后撤离之交通工具。十二日下午，主要街道上便置有大桶汽油煤油，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“焦”字，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。同时，国民党政工人员在交通要道两旁的墙壁上书写日文标语，作为对敌人的宣传，气氛因之大变，好象敌人就要到来。当时整个市区商店开门营业的极少极少。最繁华的八角亭一带大商号都停了业，仅有极少数店员留在铺里聊天。下午六点，警备司令部又召开紧急会议，要求各机关团体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。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偕六点到三个分局检查工作，七点多回机关时，发现机关文件及他本人的行李，都已清理捆扎，并正待运上船，候令开船逃走。入夜，流言益炽，岗警亦多擅离职守。长沙成了一座死城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国民党政府当局对预定的焚城计划，严加保密，外界毫无所知。人民群众思想上毫无准备。

十一日，市商会主要负责人、湖南电灯公司总经理肖莱生，为电灯公司搬迁问题来警备司令部找副官处长沈印心，沈陪同肖去找鄞悌。鄞悌答复说：“前方尚好。百姓疏散无妨，电灯公司撤出长沙还没有接到命令。”

十一日晚，康泽从江西来长，在警备司令部摇电话给关麟徵，关回话说：“前方平静。”

十二日上午，为纪念孙中山诞辰，市府在教育会坪举行集会。市长席楚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，说敌人尚在新墙河以北，老百姓就疏散，这对前线将士的给养、伤员的转移和护理，都极为不利。他要求商店开业，市民安下心来，已经疏散的要迅速回城。晚上，他率领市府所属人员及各团体人士约三百人参加火炬游行，队伍经求风井、八角亭、市正街等主要街道，直至南门外。

但是，就在这天夜里，国民党反动军警竟然纵火焚烧了长沙，对全市人民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。全城熊熊火起。留城的老百姓或被放火队事先叫起，或从睡梦中惊醒，都以为敌人真的打进来了，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争相夺路逃命。一些尚未被火封住的街巷，顷刻间被人流堵塞。在这混乱不堪的时刻，有的被人群踩死，有的被汽车压死。席楚霖回忆说：“这时只见天心阁火光四射，接着全城火起，市民从梦中惊醒。面对熊熊烈火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，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。我督促司机加足马力向湘潭方面驶去，沿途混乱情况更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拖儿带女、提箱背包的，裹着被条背着老人和小儿的，哭的，骂的，争先恐后，络绎不绝。”人们大骂国民党，“放火为什么不把信给老百姓”。

纵火时，我党在长沙的公开办事机构——八路军驻湘办事处，事先没有得到一点信息。当时在长沙的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同志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这天晚上九点，周恩来同志还同陈诚、张治中通了电话，他们都说没有什么动静。特别是张治中，连说两次前线“风平浪静”。周恩来同志在撤离工作安排

妥贴后，大约在晚十点左右，才从三厅驻地长沙师范回到寿星街“八路军驻湘办事处”。当时他估计，当晚大概不会出什么岔子，比较放心了；加上已经两天两晚没有睡觉，极度疲困，便睡下了。大约午夜后两点，办事处周围发现了熊熊大火，很快就烧到了办事处。据当时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刊载的报道说：火舌伸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住房。周恩来同志被惊醒后，急忙撤离寿星街，随身只带了机要文件及一台老式收发报机，十三日下午到达湘潭。是时长沙已成为一片火海。

谁是纵火犯

长沙大火后，群情激愤，怨声载道，切齿痛骂蒋介石，也骂张治中。全国人民要求追查责任，严惩纵火犯。十四日，蒋介石由南岳到长沙，登天心阁亲睹大火后的长沙惨状，听到人民的愤怒呼喊，知道众怒难犯。为了缓和局两，并为自己不得人心的“焦土政策”开脱罪责，便下令组织军事法庭，审判有关人员酆梯、徐昆、文重孚。审判长是钱大钧，审判员是蒋锄欧、张耀辰，军法官是阎景瑜、王柔远，审判地点在蓉园何键别墅。审判结果，判处酆梯等三人死刑，并在大火后第八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处决。同时，给张治中以“革职留任”的处分。

湖南省政府行署宣导处编印的《长沙火灾纪实》刊载的处决酆梯等人的布告如下：

长株警备司令部（司令俞济时）的布告：案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十一月皓代电开：案查湖南省会警备司令酆梯、警备第二团团长江徐昆，辱职殃民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、陆军宪兵上校文重孚，未奉命令，放弃职守，均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判，各处

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在案。兹将该犯等三名移交该部，仰即布告罪状，一面验明正身，依法执行，具报。计鄧悌，男，年三十七岁，湖南湖阴人，前湖南省会警备司令。徐昆，男，年三十二岁，湖南新宁人，前警备第二团团长。文重孚，男，年三十五岁，湖南益阳人，前湖南省会警察局长、陆军宪兵上校。等因奉此，遵将该犯鄧悌、徐昆、文重孚等三名提解到部，验明正身，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押赴侯家塘下山刑场，依法执行枪决。除呈报外，合亟布告军民人等，一体知悉，此布。

蒋介石对纵火责任的追究和处理，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。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“三个人头万古冤”。那么谁是纵火犯？鄧悌等人应当负什么责任？这要考究一下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纵火是一件与军事行动不可分离的事，命令应该发自军事当局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说：“具体放火时间，由鄧悌亲自掌握。”但大火发生时，鄧悌在寿星街家里。省政府一依姓王的秘书发现大火时打电话到鄧悌住所找鄧悌。接电话的副官说：“司令已经睡了。”不肯叫醒鄧接电话，并不等对方把话讲完，便把电话挂了。鄧悌是从睡梦中惊醒的。鄧悌惊醒后，因与职责有关，焦急万分，忙打电话找参谋长追问，而参谋长已去向不明。鄧悌又急忙去会张治中。两人会见后，相互询问：“是否下令放火？”但都说“不知道。”这时，电灯电话线路均被烧断，他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。张治中见鄧悌沮丧的窘态，便说：“只要你没有下令放火，问题以后再设法解决。”后鄧悌被处决，张治中认为他“死于直接职务，他并没有下达焚城的命令。”

敌人尚远在三百里外即纵火，与当时社会秩序的极端动

荡和混乱有关。文重孚当时对治安没能控制住，警察擅自离岗逃亡的现象十分严重。据接近警察局领导核心的文的秘书吴世佶回忆：在十二日晚六点，他奉文重孚之命到三个分局检查工作，发现有的分局尚有极少人在机关，但都在收拾行装准备撤离，有的分局只有几个头头在位。岗警擅自离岗，“值勤警察逃走后，就加派一班人去值勤，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。再派一班人去追，连追的人也跑了。约计逃跑了几百人。”警察逃离岗位，谣言蜂起，甚至谣传敌人先行部队已到达桥驿、霞凝附近，等等。社会秩序大乱。这天晚上，文重孚与他的几个亲信守在局里，清点文件，收拾行装，等待撤离命令下达后即逃。大约午夜后一点多钟，文重孚分别打电话给张治中、鄧悌，但均不通话。文即带领几个人外出察看动静，发现登隆街、白马巷口浓烟漫天，便迅速赶回局里，撞响了警钟。他们也就匆促向南撤离，直至湘潭。

那么，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？据众多的回忆材料记述：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，长沙警备司令部担心放火工作有误，便决定举行一次放火演习，以检查各有关负责单位对于放火各项具体规定、人员与物资的准备工作，是否完善。徐昆系负责焚城的指挥，故这一工作由他负责执行。徐昆检查完毕后，用电话向司令部汇报，请求检阅。电话是石国基接的。石回答说：“接徐权处长电话，敌人已过新墙河，来不及检阅了。”徐昆将石参谋长的电话向下传，其所部某连长误听为“敌人已过新河”，首由这位鲁莽连长下令点火。其他各处见有火起，相继点火。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沈印心回忆说：“睡不久，警卫鄧瑞林走到床前喊我，并说市内起火……上楼呼喊石参谋长。洵

问是否下令放火。石说，没有。于是我们一起登楼观望，这时城内已有几处起火。我们赶忙下楼，叫司机开一吉普车，急驶到八角亭口，只见三个士兵，全副武装，有的手持十字镐，站在街心，有的则点汽油放火。我们问：谁要你们这样做？他们说：是团长的命令。我们又问：哪个团长？答：徐团长。”这说明国民党军政府的腐败无能，指挥系统已经失灵。

这次军法会审的主要承审员张耀辰，回忆审判鄧佛等人时说：鄧佛、徐昆、文重孚都说没有接到放火的命令。

再说张治中。张被处以“革职留任”，有的人很高兴，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。匾额是“张惶失措”，对联是“治绩云何，两大方案一把火；中心胡忍，三个人头万古冤。”在这里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，流传甚广。张治中是有愧于长沙人民的，后来他在一份电文中提到“痛疚尤深”。但是，“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。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。”（见郭沫若《洪波曲》1979年版219页）一九五九年，张治中对长沙大火曾有一段追述：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，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：‘限一小时到。长沙张主席，密，长沙如失陷，务将全城焚毁，望事前妥密准备，勿误！中正文侍参。’同时，还接到当时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：‘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。’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的。一年来的工作，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我怎忍使长沙市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。所以思潮起伏，矛盾苦闷，达到极点。但是，不执行命令是不行的。蒋介石当时是最高统帅，我是省主席，理应服从命令。同时，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，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政策的宣